

“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

DEUTSCHE PHILOSOPHIE, DEUTSCHE KULTUR UND
CHINESISCHES PHILOSOPHIEREN

张祥龙 著



“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

DEUTSCHE PHILOSOPHIE, DEUTSCHE KULTUR UND
CHINESISCHES PHILOSOPHIEREN

张祥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 / 张祥龙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中德文化丛书)

ISBN 978-7-5446-2469-5

I. ①德… II. ①张… III. ①哲学—研究—德国②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516②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118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6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469-5 / B · 0022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本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德国唯心主义与德国浪漫派的冲突和融合”(批准号:2009JJD720002)。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

“中德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
陈洪捷 北京大学
范捷平 浙江大学
李明辉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麦劲生 中国香港浸会大学
孙立新 中国海洋大学
孙周兴 同济大学
卫茂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武能 四川大学
叶 隼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国刚 清华大学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Adrian Hsia 夏瑞春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Françoise Kreissler 何弗兹 法国东方语言学院
Iwo Amelung 阿梅龙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Joël Thoraval 杜瑞乐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Klaus Mühlhahn 余凯思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Michael Lackner 郎密榭 德国埃尔郎根大学

总序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对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因为,两种

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因为在地理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另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阈（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述）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

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照示者也。”这不仅是 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前者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

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划地自牢”,因为只有将视阈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之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 20 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为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得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外教社）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内容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叶隽

2007 年 4 月 27 日至 12 月 22 日间

陆续作于巴黎—布达佩斯—北京



序

在西方世界中，德意志民族是独特的。其来源或许是一种幽深的民族记忆，一种总比现成的历史记载还窈冥的记忆。在基督教的历史之外，德意志记住了古日耳曼；在罗马帝国的辉煌之外，她记住了神话般的希腊；在启蒙和科技之外，她记住了格林童话和条顿传说的森林、妖仙、天鹅和骑士；等等。而情况似乎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有多长，她的哲理思潮就有多深，她的性格就有多奇。于是，在天主教森严的教会之外，出来了与神直接相通的艾克哈特和马丁·路德；在唯理论的逻辑框架中，涌现出莱布尼兹的玄妙单子；在康德、黑格尔之后，一定要杀出忧郁的叔本华、绿林豪杰般的马克思、尼采和让西方人常常摸不着边儿的海德格尔；而在歌德、席勒如日中天的光辉下，荷尔德林疯狂的黑暗才让 20 世纪的满天繁星闪现……

所以她的资本主义进程总走拗步，有时因为不情愿而慢极，有时却因发狠而快极。20 世纪的两大偏离——共产主义和纳粹——都与她有内在关系。她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两次都失败，却是第一个让绿党入阁的国家；她从心里就不服英、美、法，但还是一直在反省，甚至下跪……

德意志，你是个谜。

这本文集的文章基本上都与德国文化，特别是德国哲学有某种关系，是我在德意志这座古奥迷离的黑森林中徜徉驻足的感受和领会。作

为一个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视野，所以这些文章中的相当一部分带有中国印记。而且，我甚至感到中华文明在面对西方塑造的全球化时，所处情境与德意志的现代遭遇有某种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可比之处。

中国人的记忆本来是现存民族中最长远的，也最不受什么现成框架限定。例如，中国人一直还在使用完全独自创立的文字，实乃不可思议的历史奇观。全人类只有四个民族——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华夏人、印第安玛雅人——独立地创立了文字，其他所有文字都是衍生的。好像是理所当然地，其他的那三个古文字乃至使用它们的民族，早已灰飞烟灭，只留下泥版、草纸和各种金字塔。但华夏一族一文居然历时三四千年而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令许多西方人大惑不解，发了一些不得要领的议论。而且，华夏人不仅有独步环宇的历史记载，更有越出它们的源头记忆，比如伏羲、黄帝、尧舜，是华夏的灵感之泉，《易》、道、儒都朝向他们而存在，从来不甘心秦汉以来的那套体制，也不甘心像日本人那样去学西方。于是有了《南京条约》、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庚子赔款，但后来，就是发了疯一样地全盘西化，仇视自己的记忆，非要把它耻辱化到只配完全被毁灭和遗忘不可。

因此，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类似于德国，都是战败国。自己的文化与现在流行的文化——如果还能称之为“文化”的话——格格不入，所以必弃之而改宗换姓，以求生存，甚至是“崛起”式的生存。这样一来，发展得倒是快了，因为毫无传统的羁绊或护持，完全实用化，完全强化、奥运会化，二十年修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赶得上美国修一百年的。中国和德国都想通过拼命干活挣钱来忘掉自己的过去，来证明自己的现在——一个进步了、强大了、脱胎换骨了的现在。但是，活的自身记忆的真实性和宿命性在于，如果排斥它，让自己失忆，你虽然还有正常的线性理智，却会丧失那导致深刻创造性的自由想象力。这就是中德两国今天都面临的问题。

以上所讲，丝毫没有反对德国反省纳粹灾祸的意思。相反，这种反省倒是要更深更远才好。我只是觉得，它不应该以抛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而盲目追随美英带头的全球化为代价。实际上，纳粹德国根本不是德意志精神的恰当表现，它太崇拜力量、土地、血统这些对象化、现成化的

东西,缺少原发的想象力。真正的德意志,崇尚的不是力量,而是清新高洁的生存状态和丰满悠远的精神世界。

中德的语言虽然形式上相差巨大,但也有某种神似之处。德语的构词性极强,许多词都是虚实搭配或由一词根繁衍而成,所以往往可以直观和双关。比如哲学中的“aufheben”(一般译作“扬弃”,不妥),由虚词“auf”(向上)和实词“heben”(举起)构成,合起来,既可以是“捡起来装进袋子”,又可以是“捡起来丢掉”。这直觉双关义被黑格尔利用,意指辩证发展中同时发生的扬弃与保留。海德格尔是感受和利用德语构造性的大师,他使用乃至创造的关键词无不既直观又双关,既用习惯义,又同时用纯字面义,比如“Dasein”、“Mitsein”、“entfernen”、“zu-der-Tod-sein”、“entschlossen”、“Er-eignis”、“Ge-stell”等等。汉语则是构词的渊藪,不用说双字词是构造的,单字一样是构造的,如“日”、“明”、“川”、“河”、“木”、“林”、“森”、“刀”、“刃”等等。

所以,德语养育的德国思想,虽是唯理精准,却有直观的洞察;虽重直观,却又不限于感觉直观,而是于思辩中有生命冲动力,总在与自身缠绕,力图辨别出更切近的预设者,以便进入更深的源头。但它过于习惯于体系化,不如法国式与英美式的思想灵巧,却能在英国人、法国人看作是单个实体(像“感觉”、“我”、“物质”)那里找出发生的结构,比如莱布尼兹的单子、康德的先天综合形式、黑格尔的具体概念、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叔本华的求生意愿、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海德格尔的缘构发生、罗姆巴赫的生活结构,等等。这些精神生命化的思想,形式的严格中又有双关互映,洋溢着不尽的余音和深远的可能,总有玄思奇想的内空间。于是科学与浪漫、理性与远古或并行不悖,或前赴后继,里面既生成着全新的可能,也潜伏着危险。德语思想从来都不甘于平庸,都爱冒险。那些对于语言和思想的彻底构造性特别敏感的德国人,如莱布尼兹、海德格尔、海森堡、罗姆巴赫等,对遥远的中国古代哲理产生了内在的兴趣,感到了某种协音共振的微妙。而中国人面对西方时,也只有到了德国哲学那里,才算稍稍尽了兴。

本书包含五个部分,共十八章,外加两个附录,基本上由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组成,为了这次出版,做了某些修改乃至改写。

第一部分是中德文化与思想关系的泛论，既有个人在德国的切身感受，又回顾了现代中国人引入当代德国哲学的历程，还反过来一瞥老子进入德国的契机与意义。

第二部分研究几位德国哲学家们的学说。很少受到哲学界关注的康德的亲子观，其中既有不俗的见地，即看出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某种超出了一般社会关系的根本联系，又很成问题，因为他认为这种联系中没有内在时间过程，完全取决于子女自由意愿的行使，因而否认子女需要尽孝的道德和法权义务。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现象学方法，特别是生存解释学的方法，是另一篇文章的议题。这部分的第三篇文章试图揭示叔本华、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出自奥地利，从严格意义上不算德国哲学家，但属于德语哲学的世界）的音乐观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哲学和语言观。这就是以上谈及的德语对哲学的思想影响，音乐居然会直接进入哲学，这在其他近代西方民族的哲学视野中是不可能的。

第三部分阐发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多重关系，以及他思想形成期和晚期的两个重要思路。近二十年来，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海德格尔论及“道”的材料，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的道缘与他自己思想的内在关系。但是，一些不明了海德格尔的话语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人，往往片面夸大海德格尔对于跨文化哲理交往的谨慎，以及对于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和德国哲学独特性乃至优越性的强调，做些表面文章，否认海德格尔哲学与东亚思想，包括与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或共鸣。这部分的第一篇论文以事实和分析回应了这种肤浅怀疑论，并展望了中国哲学与海德格尔在什么问题、以什么方式可能有深入的交流。附录是一篇译文，提供了更多的有关事实和观察角度。“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思想方式的起源指标，而“Ereignis”（自身的缘构发生）则是他后期思想的灵魂，与阴阳道论亦有关系。后两篇论文分别讨论之。

第四部分讨论象(Bild)的哲理，区分象思维与哲学界流行的概念思维，并通过海德格尔对康德“纯象”学说的解释，来深化关于象的理解，乃至关于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与时间》的理解。

第五部分先讨论胡塞尔开创、海德格尔等人深化的现象学如何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接着通过这个现象学的新视域，来阐释和回答一些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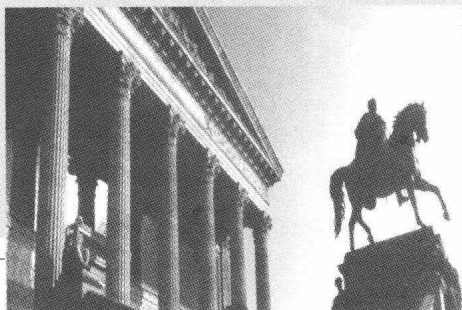
题：如何看待西方来的哲学与中国道术的关系？如何恰当地理解孔子？中西哲理的差异何在，产生它们的原因又是什么？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干“形而上学”与古希腊数学有什么不解之缘？如何估量和进行跨文化的哲理翻译？最后两章，一章表述建筑现象学，通过理解乃至批评海德格尔的人类“栖居”观，探讨非高科技的或阴阳生态化的“家居”可能；另一章论述东方人心目中的智慧，如何通过原时间而与无明有了内在联系。

我学习德国哲学、感受德国文化的经历，起自三十多年前恩师贺麟先生的接引。本书第五章对此事稍有提及。贺师在学界中以引进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为顶峰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著名。祥龙有幸，在“文革”中受教于他老人家，这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且，贺师的成就绝不止于翻译绍述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深而创新的哲学家，发掘出中国古代哲理的直觉方法，以作为辩证法的明目慧眼。所以，他不仅是当代新儒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而且颇有现象学的见地。他那直捣黄龙、在学习西学要义的过程中儒化西学的勇气和见地，一直是引导我学术追求的夜航灯塔。

明年将是贺先生逝世 20 周年、诞辰 110 周年。不才弟子如我，沐浴深恩厚德，谨向吾师献上此拙著，以寄托无限感念与追思。

辛卯年元月

张祥龙书于雪霁塞外



目 录

序

第一部分 中国与德国

- 一、德国文化感受 3
- 二、中国的现代德国哲学研究选述 16
- 三、“老子在德国”专栏引言 41
- 附录：海德格尔致齐格弗里特·布略泽先生七十诞辰贺信 44

第二部分 德国的哲学家们

- 四、康德论亲子关系及其问题 49
- 五、从辩证法到生存解释学 62
- 六、叔本华、尼采和维特根斯坦 67
- 音乐化的哲理观和语言观

第三部分 海德格尔与中国古哲

- 七、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事实、评估和可能 87

附录：再论海德格尔与老子	110
八、生存与形式指引	123
——海德格尔思想方式的路标	
九、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Ereignis”的含义	146

第四部分 象的哲理

十、概念化思维与象思维	159
十一、海德格尔的《康德书》	171
——“纯象”如何打开理解《存在与时间》之门	

第五部分 现象学研究中的问题

十二、现象学如何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	195
十三、现象学视野中的孔子	207
十四、中西哲学的差异与原因	216
十五、西方形而上学的数学来源	230
十六、中西哲理文字的可译性	238
十七、栖居中的家何在?	251
——非高科技的建筑现象学探讨	
十八、智慧、无明与时间	267